西夏、契丹文字的比较研究

于　宝　林

在民族古文字研究中，文字比较研究占重要地位。在我国历史上，有一些少数民族在创制本民族文字时受汉文化的深刻影响，借用汉字并加以改造，我们对这些文字进行比较，看看他们都是在什么情况下借用汉字的，而在借用汉字时又是如何改造汉字的，有哪些成功的经验以及失败的教训，还是很有意义的。

在中国历史上，西夏与契丹可以说是同时代的两个王朝，一个雄踞东北，一个统领西北，都是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建立的政权，也都是在开国之时创制了本民族的文字，创制文字时皆以汉字为蓝本，文字形式与汉字相类(有人称其为“汉字文化圈”)。然而，通过我们深入考查，发现这两种文字在借用汉字时却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。因而，对这两种文字进行比较研究，不仅有利于促进对这两种文字的深入研究，而且能使人们从一个侧面更深刻地认识这两个民族历史文化的异同。本文试图就此谈点个人浅见，以就教于诸位同仁。

一、创　　制

关于西夏文字和契丹文字的创制，从创制时间上看，契丹文字创制于10世纪初，西夏文字创制于11世纪初，都产生于我国历史的中世纪，可以说是同时代的产物。具体来说，契丹大字于辽太祖神册五年（公元920年）制成，这在《辽史》中有明确记载：神册“五年春正月乙丑，始制契丹大字。”九月“壬寅，大字成，诏颁行之。”①主持制定者，是契丹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，《辽史》有载：“太祖制契丹国字。”②至于契丹小字，史籍虽未载其确切年代，据学者考查，是在契丹大字制成不久，由阿保机二弟耶律迭剌制定的，《辽史》云：“回鹘使至，无能通其语者，太后谓太祖曰：‘迭剌聪敏可使。’遣迓之。相从二旬，能习其言与书，因制契丹小字，数少而该贯。”③关于西夏文字的创制时间，历史文献有不同的记载，《辽史·西夏传》记为西夏开国皇帝元昊之父李德明主持制定的：“德明晓佛书，通法律，尝观《太一金鉴决》、《野战歌》，制番书十二卷，又制字若符篆。”④而同是元人脱脱所撰之《宋史·夏国传》中却记为是元昊主持创制的：“元昊自制蕃书，命野利仁荣演绎之，成十二卷，字形体方整类八分，而画颇重复。教国人纪事用蕃书，而译《孝经》、

们的头脑和心灵多么广阔，都应当装满你们的时代的思想感情”，从而创作出既反映民族精神、具有鲜明的民族性，又体现了时代本质和历史潮流、推动民族进步和历史发展的优秀的回族文学作品。

〔作者单位　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〕　　（责任编辑　丁　峻）

© 1994-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　http://www.cnki.net

《尔雅》、《回言杂字》为蕃语。复改元大庆(公元1036年)。"⑤我们参照宋人沈括所撰《梦溪笔谈》⑥、曾巩所撰《隆平集》⑦和李焘所撰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⑧，特别是当时西夏人所写《妙法莲华经序》所记："风角城皇帝（指元昊）以自国语言，兴起蕃礼，创造文字，翻译经典……。"可见，西夏文字是元昊继王位（公元1031年）后，在称帝、建国号（公元1038年）前夕，组织以野利仁荣为首的班子创制的。

再从创制背景看，两种文字都是在建国时期创制的。一在建国前夕，一在建国后数年。请看下列时间表。

契丹907年：耶律阿保机"燔柴告天，即皇帝位。""上尊号曰天皇帝。"⑨　916年：始建元"神册"。（由于称帝与建元时间不一，史学界对契丹开国的具体时间有不同的认识。）　920年：制契丹大字。不久，制契丹小字。

西夏1032年：元昊受封"夏国王"，改宋"明道"年号称"显道"。　1034年：始建年号"开运"。　1036年：制西夏文字。改元"大庆"。继更定礼乐。　1038年："十月十一日，郊坛备礼，为世祖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，国称大夏，年号天授礼法延祚。"⑩

两国的建国时间虽然相差一个世纪，其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实力也不尽相同，但两国建国后都面临中原宋政权（契丹建国后还面对过50余年的中原五代更替政权），以宋为代表的政权是以汉族为主体，占据中原广大地区，其经济、政治、军事皆有相当的实力。从当时的整体形势看，契丹——宋——西夏呈三角鼎立之势（其中西夏国力最弱）。若从民族文化上看，汉族文化之先进与深厚是西夏和契丹所不可比拟的。无论西夏，还是契丹，在立国前皆长期受汉文化的影响，虽然在长期交往过程中，汉族也或多或少吸收了西夏文化与契丹文化（尤其是杂居地区），但汉文化对西夏与契丹的影响却强烈得多，深刻得多，可谓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，这在文字创制时借用汉字就是一个突出的表现。

关于创制原因，西夏、契丹有共同之处，首先是政治的需要。两民族在建国前皆无文字，历史记载，契丹"唯刻木为信"⑪。契丹按其族源可远溯至先秦时期之东胡，东胡——鲜卑——契丹是其发展的大脉络，以"契丹"族名见诸史载最早见于《三国史记》：小兽林王八年(公元378年)"契丹犯北边，陷八部落。"⑫北齐人魏收所撰《魏书》始立契丹专传，若按这个时代算起，契丹到开国创制文字时已经经历了500多年的发展时期。西夏政权是党项民族建立的，党项为我国远古羌族的一支，亦称党项羌，若按"羌"之论其族源，比契丹之源于东胡还要久远，"党项羌"最早见诸史载是在南北朝时期（6世纪后期），以此算起，到建西夏王国，也经历了近500年。在这一不算很短的历史时期中，西夏与契丹一样，"无文字，但候草木以记岁时。"⑬两民族强大后逐步统一了周围地区，尤其是建立国家后，没有"国字"，无论是在国内，还是对外交往都很不方便。几百年历史的发展，统一政权的建立，这些都为文字的创制创造了必要的、良好的条件。

历史上各种文字的产生，不外是两种情况，一种自下而上，一种自上而下。前者是约定俗成，再经官方认定（有的民族未建立过政权，也就无所谓官方认定），后者则是官方制订，依靠政治力量加以推行。我们看到，西夏、契丹都是属于后者，是由最高统治者主持制定的，不言而喻，统治者主持制定文字，从主观愿望上首先考虑的是政治的需要，是为了加强统治的需要。

© 1994-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　http://www.cnki.net

西夏、契丹创制文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民族感情的驱动。从当时情况看，两国建国后，统治区域扩大了，在其统治下，有不少汉族和汉化了的少数民族，有相当部分的汉族地区和杂居地区，这些群众和这些地区长期使用汉语和汉字进行交际，建国后若因势利导径自使用汉字亦无不可，尤其是党项民族，很早就归附中原隋、唐王朝，几经内迁，在其居住范围内有大量汉人，可以说，汉文在境内已经是通行的文字。但是，无论是以元昊为代表的西夏统治者，还是以耶律阿保机为代表的契丹统治者，在其力量壮大起来后，面对着先进的汉文化，他们既仰慕（自觉不自觉的学习和吸收），同时又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情感和复杂的心态。史载，元昊"性雄毅"，弱冠为太子时即对父臣宋政策不满，"数谏其父毋臣宋，父辄戒之曰：'吾久用兵，疲矣。吾族三十年衣锦绮，此宋恩也，不可负。'元昊曰：'衣皮毛，事畜牧，蕃性所便。英雄之生，当王霸耳，何锦绮为？'"⑭即位后，他更是处处对宋不恭，在准备脱离宋的"羁縻"而称帝建制时，十分强调民族特点：易年号，改姓氏，下令秃发，突出民族风俗标志，更定服饰，"以胡礼蕃书抗衡中国"。创制文字，既是他为开国所做的一种准备，也是其强烈民族意识的突出表现，《宋史》记元昊致宋表云："制小蕃文字，改大汉衣冠。衣冠既就，文字既行，礼乐既张，器用既备，吐蕃、塔塔、张掖、交河，莫不从伏。"⑮契丹耶律阿保机亦如然，他虽然仰慕汉文化，早年就会说汉语，"然绝口不道于部人，惧其效汉而怯弱也。"⑯可见，元昊、阿保机力主创制本民族的文字，从一定意义上说，是为了显示其民族特点与地位的一种举措。

然而，历史的长河在这里打了一个小小的漩涡，出现了一种使人颇感兴味的现象：在强烈民族感情的驱动下，为"对抗"汉字而创制的本民族文字，却不顾及各自民族语言的特点，不约而同的投身于"汉字文化圈"的怀抱，这是历史的偶然，还是一种必然？不得不引起我们诸多的思考，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。

二、文　字

西夏字、契丹字都是依仿汉字而制，但两种文字在改造汉字时所走的道路却不相同。我们看到，这两种文字的字体形态、笔画走向，以及书写规则等都是与汉字相同的。若单从字的形态上看，契丹字更接近于汉字，无论是契丹大字，还是契丹小字（指原字），有一部分形体完全沿用了汉字，未作丝毫的改动，契丹大字如：之、田、南、外、住、仁、弟、有、未、高等；契丹小字如：丁、丙、丸、杏、山、天、木、土、小等。西夏字却无一字与汉字同。而这种相同与不同仅仅是形式上的表现，如果从文字实质上去探索，情况正相反，西夏字更接近于汉字，契丹字由大字到小字，离汉字越走越远。

从笔画上看，西夏字比汉字繁冗、复杂〔见文后例字（一）〕，在今所见的6 000多个西夏字中，大多在10画以上（西夏字在笔画上的特点之一是笔画比汉字均匀），5画以下字极少。而契丹字对汉字来说，则走的是一条简化的道路⑰。

从文字性质来看，西夏字中虽然也出现了部分拼音字，但从总体上说，尚未脱离"表意文字"（或"音意文字"）的范畴，这是与汉字相同的。契丹字则不然，因契丹大字尚未获得令人满意的解读，暂且不去推说，就契丹小字而论，属于拼音文字绝无问题，这是与汉字迥然不同的。

从文字结构上说，西夏字的造字法基本上是沿着汉字"六书"（象形、指事、会意、形

© 1994-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.net

声、转注、假借）的路子而有所发展，有的学者就是比照汉字“六书”来分析西夏字的。当然，西夏造字并未完全死套“六书”（其实，“六书”也是后人对汉字造字规律的一种归纳，并不是造字时的一种法则。而且，“六书”归纳得对不对，历来也有所争论，我们这里也是一般地说。西夏制字时是否明确以“六书”为法则，本无直接的说明，也是后人的一种分析。）西夏字多为合成字，比起汉字来，象形、指事字少。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？我认为，这是时代不同、创字背景不同所致。汉字产生于远古，是“逐渐形成的”，西夏字生成于中世纪，是“借形创制的”。

从文字发生学来看，人们认为，文字来源于图画。因此，在远古“逐渐形成”的文字中，象形、指事字占比重较大，在此基础上引发出形声、会意字，汉字中就保留了一些象形、指事字的踪迹。而后来创制文字，就完全没有必要再走“图画”的道路，往往借鉴他种文字的符号加以改造，以适应自己的语言。在借用某种文字符号时，或借其音，或借其形。这就是西夏字象形、指事字少的主要原因。这种情况并不构成西夏字与汉字在文字性质上的差别，占西夏字绝大多数的会意合成字和音意合成字，则与汉字的会意字和形声字路数相同。我们说西夏字对汉字的发展，主要是指西夏字中出现的那部分类似拼音构字法反切上下字合成，然而，这部分量不多，还占不到总数的百分之一。

契丹字虽亦借汉字形体，但与西夏字的发展道路不同，完全脱离“六书”之路而向拼音方向发展。例如契丹原字〔见文后例字（二）〕。契丹小字是以简化了的汉字形体作为原字〔见文后例字（三）〕，再由1至7个原字像堆小山似的组拼成契丹字词，组拼的规则〔见文后例字（四）〕。从形体上很容易分辨出契丹小字与汉字、西夏字的区别，这种文字“形象”在汉字文化圈中也是很少见的。

西夏字与契丹字在借用汉字时之所以有此不同，究其内在原因，笔者认为是受其语言的制约。西夏语属汉藏语系，与汉语接近；契丹语属阿尔泰语系，与汉语差距大。单就契丹语中的多音节词现象（如“孝”，契丹语读“赤失得本”），“方块”的容纳力与表现力就显得力所不及，何况词的派生和语法变化都以附加成分为主要手段，这些要用一个个“虚字”来表示就更困难。

一开始，西夏与契丹在借用汉字时就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：前者繁化，但仍表意；后者由简化走向拼音。前者为什么繁化？我认为这不是文字本身的原因，而是政治原因，前面谈到，西夏制字是民族强大后民族意识的驱动，可视为一种自觉的行为，而创字时受汉字深刻影响是客观环境所致，可视为一种不自觉的行为，这就是西夏字既仿汉字但又处处不与汉字相同的根本原因。不仅西夏如此，就拿契丹小字来说，原字比汉字简化只是从整体上说，个别也有繁化的现象，如数字〔见文后例字（五）〕。

三、行　用

西夏字、契丹字都是官方创制的，最高统治者对制字非常重视，字制成后，将其称作“国字”，借用国家的行政力量进行推行。《辽史》记：辽“太祖制契丹国字，鲁不古以赞成功，授林牙、监修国史。”⑱《西夏书事》记：“元昊既制蕃书，遵为国字，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。”⑲

我们看到，字制成后，首先用于外交书函，《五代会要》有记：“（后唐）王晏球又获

© 1994-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.net

契丹绢书二封来进，上命宣示群臣，其文字莫有识者。”⑳从现有材料来看，契丹字还用以译书（《辽史》记曾译《律文》㉑、《阴符经》㉒、《方脉书》㉓、《通历》、《贞观政要》、《五代史》㉔；《契丹国志》记曾译白居易《讽谏集》㉕；《直斋书录解题》载译书《辨鸠录》㉖等）、官印、符牌、刻碑、墓志等等。西夏的外交文书除对宋附汉字外，对周边的吐蕃、回鹘等皆用西夏字。国内，官方西夏文字的文书禀帖、法典条令；民间的契约字据；以及文史、语言、医药、历法著作；各类辞典字书；翻译儒家经典（如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孝经》等）和佛经，还有碑刻题记、金石铭刻等等都有实物的发现，数量相当可观，如西夏文佛经有数千卷之多，石刻题记有一百多处。由此可见，西夏文的使用是很广泛的。

两种文字都同样经过官方的大力推行，但效果却不一样，历史事实告诉我们，契丹文字远不如西夏文字深入与普及。从现有资料分析，我认为，契丹字虽然推行了两百多年，但始终未能行用开。为什么如此？有社会原因，也有文字本身的原因。

先谈社会原因。契丹强大后，大举南下，占据了以燕云十六州为中心的广大汉族地区，形成其境内经济、文化极不平衡之势，南北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，汉族地区早已是发达的农业地区，而契丹腹地居民仍过着游牧的生活。《辽史·营卫志》称：“长城以南，多雨多暑，其人耕稼以食，桑麻以衣，宫室以居，城郭以治；大漠之间，多寒多风，畜牧畋鱼以食，皮毛以衣，转徙随时，车马为家。”长城以南主要指汉区，文化先进，人们长期使用汉语、汉文，要在这些地区推广契丹语文，让人们重新习用新文字，生活上无此需要，因而也不可能。何况，契丹实行“因俗而治”的政策，“以国制治契丹，以汉制待汉人。”㉗允许汉语文通行，所以，契丹文字未能在汉区行用则很自然。当时契丹国之南京（今北京）文化发达，为全国冠首，人才济济，很多影响大的文化事业，如《龙龛手鉴》的修撰与《契丹藏》的刊刻都是在这里进行的。尤其是在藏经史上有很大名气的《契丹藏》的刊刻，历时70余载，成579秩，辽道宗还曾作礼物赠与邻国高丽，可见统治者的重视。另外在南京附近，今房山云居寺镌刻的《房山石经》，其规模亦异常可观。凡此种种，皆以汉文行之，今不见一契丹字之形迹，与西夏文佛经之浩，形成鲜明对照。

再有，从现已发现的大小101件辽代契丹文资料（现知契丹字资料共110件，有2件西辽，7件金代在此不计，时代不详的皆算）来看，除28件出土地不详外，属上京道的有34件，中京道的18件，东京道的21件（大部分是官印），南京道和西京道的1件也没有，这绝不是偶然的。这是汉区的情况，契丹本区呢？长期文化落后不说，《辽史》记当时当地的情况是：地广人稀，“旷土万里”，“劲风多寒，隋阳迁徙，岁无宁居。”㉘“秋冬避寒，春夏避暑，随水草就畋渔，岁以为常。”㉙在这样的地区推行契丹字其困难程度可以想见，若不下绝大的力量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

然而，我们来看看契丹的统治情况。契丹以武力立国，当时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军事。对内，要对付各种反叛。阿保机开国之初就遭到诸弟的数次反叛，史载其激烈程度：“士卒煮马驹，采野菜以为食，孳畜道毙者十七八，物价十倍。”“民间昔有万马，今皆徒步。”㉚翻阅辽朝各代的历史，可谓叛乱不断，其中两个皇帝（世宗、穆宗）就为叛兵所杀，道宗亦被叛军所围，险遭罹难。对外，抵御宋的北伐和南下伐宋。这些都是当时统治者的主要精力之所在。根本不可能把推行契丹字放在那么重要的地位。

契丹的统治还有一个特点。契丹建辽后，虽然先后有五京之设，但皇帝“游田之习，尚

© 1994-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.net

因其旧。”㉛平时处理国事并不固定在一地，“四时各有行在之所，谓之捺钵。”㉜捺钵制成为契丹特殊的基本政治制度，大约在辽的鼎盛期辽圣宗时形成定制：春捺钵在鸭子河泺，夏捺钵无常所，多在吐儿山，秋捺钵在伏虎林，冬捺钵在广平淀。最高统治集团终年盘桓于四时捺钵之间，主要官员扈从，随时随地裁治国家大事。著名辽史专家傅乐焕先生早就指出：“辽代政治中心，不在汉人式的五京，而在游牧式的捺钵。”“其君臣之日常活动在此，其国政之中心机构在此。”“虽别有五京，而临幸甚少。”㉝这些社会情况，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文字的建设。

因而，有辽一代，契丹字始终未能得到普及而真正成为社会的交际工具。《辽史》、《金史》人物传中专们写明某某人通习契丹字（人数也不多），似向我们透露，在契丹贵族中能懂契丹字的人也很有限。

除社会原因外，还有文字本身的原因。据研究，契丹语属阿尔泰语系（一般以为属蒙古语族）。汉语则属汉藏语系，两种语言差距很大。适应汉语的汉字借过来表达契丹语，本来就很困难，虽然作了种种努力，又是简化，又是拼音，但还是未能解决好。“方块字”作意符有其长处，而作音符，则不如其它文字（字母）简略、灵活、方便和适用。我们再举一个旁证来看这个问题：契丹近邻女真民族所操女真语亦属阿尔泰语系，女真建金时，也仿照契丹字和汉字创制了一套女真文字，终金一世，女真字也未能行用开，现能见到的女真字文献亦屈指可数，种类有限。而后来，这个民族再度发展起来，建立后金政权，并借用蒙古文字母再造文字——满文，其推广范围与普及程度就高得多。这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，借用方块汉字来表达阿尔泰语系的语言是很困难的，有的障碍几乎是不可逾越的。

通过契丹和女真文字的形用史使我们看到，一种文字创制时，可以由政治原因起主要作用，而能否得到行用，能否被社会所接受，真正变成人们的交际工具，除一定的政治因素外，文字本身起重要作用，（当然，影响文字还有其它重要因素，如宗教，只不过就契丹、女真来讲，其文字的创制与使用受宗教因素影响不大罢了。）可以说，政治原因是外因，文字本身的科学性是制约文字发展的内在原因。

四、消　亡

无论是西夏字，还是契丹字，如今都已消亡，成为不再通行的“死文字”了。两种文字的消亡有着共同的根本原因——民族消亡，融于它民族中。民族不存在了，作为民族重要的标示之一的语言已不再使用，文字是纪录语言的符号，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？文字自然再无人使用了，这是个很直接的浅显道理。

然而我们细察两种文字，消亡的历程却有不同。西夏字基本上是随民族的逐渐消亡而消亡的。西夏自天授礼法延祚元年（公元1038年）建国到宝义二年（公元1227年）为蒙古所灭，共历10帝凡190年。史料说明，不但终西夏一代，“国字”的使用从未间断，既使西夏亡国后，西夏文仍在一些地区和一些民众中使用。就拿刊刻西夏文大藏经来说，元代几乎未断，有时规模还相当可观，据《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》发愿文中记述，元世祖大德六年（公元1302年）刊得的就有3 000多卷，后还数次印刷，施放于西夏故地一带。元惠宗至正五年（公元1345年），在大都附近修建的居庸关过街塔，卷洞两壁刻有6种文字的佛经与咒语，西夏文乃其中之一。刊刻西夏文佛经至少延续到明代初年，故宫博物院藏有明初刻印的西夏文《高王观世音经》。现存

© 1994-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.net

西夏文资料最晚的是明孝宗弘治十五年（公元1502年）所建的石经幢，幢上所刻发愿人其中党项族有20余人，学者们正是主要依据此经幢，再参考别的资料来探讨党项族的迁融历程。

再看契丹文字，其生命力远无这么强，它早在契丹民族消亡前就丢弃不用了。契丹族何时消亡，尚不可确指，而在元代，契丹仍“明确”的存在则是毫无疑问的。然而，我们看到，契丹字除在金初还使用了一段时间外，自金章昌明昌二年(公元1191年)四月“谕有司，自今女真字直译为汉字，国史院专写契丹字者罢之”。十二月“诏罢契丹字”。㉞以后，就再也没有使用的遗迹。我们今天见到的所有契丹字资料，凡标有时间的，都是在此以前。其中以《金代防御史墓志》为最晚，时为金世宗大定十年（公元1170年），这比1502年的西夏文石经幢相差有300多年。

一种文字可能以一纸诏令为起始，这不奇怪，但已“行用”了270多年的文字却以一纸诏令戛然而止尚不多见，这又从一个侧面说明契丹字并未行用开，并未成为人们的交际工具。再看现在能见到的契丹字资料，大都是碑刻、墓志、官印、符牌、题记等，书籍一本也没有，民间常用的文书、契约、帐网等更是闻所未闻。因而，我认为，经过两百多年的实践，说明契丹字并不成功，未被群众所接受，与其说它适应了当时契丹社会的需要，还不如说其仅是某些统治人物的一种政治需要的政治行为。

注释：

①②③④⑨⑱㉑㉒㉓㉔㉗㉘㉙㉚㉛㉜《辽史》卷2；卷76；卷64；卷115；卷1；卷76；卷10；卷72；卷89；卷103；卷45；卷31；卷32；卷1；卷68；卷32。

⑤⑩⑭⑮《宋史》卷485。

⑥《梦溪笔谈》卷25：“元昊果叛，其徒遇乞先创造蕃书，独居一楼上，累年方成，至是献之。元昊乃改元，制衣冠、礼乐，下令国中悉用番书、胡礼，自称大夏。”黄任恒在《补辽史艺文志》中说，遇乞即野利仁荣。

⑦《隆平集》卷20：“元昊自为蕃书十二卷，文类符篆。”

⑧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119：“赵元昊自制蕃书十二卷，字画繁冗，屈曲类符篆，教国人纪事悉用蕃书。私改广庆三年曰大庆元年。”

⑪⑳《五代会要》卷29。

⑫《三国史记》卷18。

⑬《隋书》卷83。

⑯《新五代史》卷72。

⑰详见拙文《契丹文字制字时借用汉字的初步研究》。

⑲《西夏书事》卷12。

㉕《契丹国志》卷7。

㉖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5。

㉝傅乐焕：《辽代回时捺钵考五篇》，载《辽史丛考》中华书局1984年版。

㉞《金史》卷9。

〔作者单位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〕　　（责任编辑　天　明）

© 1994-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　http://www.cnki.net

例字

(一)西夏字

人()、手()、上()、下()、天()、地()、南()、北()、年()、女()等。

(二)契丹字

"六"音i，可组拼(懿)、(期)、(西)、(祭、济)、(密)、(礼)等。"小"音1，可组拼(尤)、(令)、(梁)、(郎、廊)、(留)、(禄)、(娄)、(礼)、(兰)、(洛)等。

(三)契丹字

如"六"为"益"之简化形式，"小"为"來"的简化形式。

(四)契丹字

一拼：为(又)；

二拼：一般为(钠)，个别为(卖)；

三拼：一般为()，个别为()；

四拼：一般为()，个别为()；

五拼：一般为()，个别为()；

六拼：为()；

七拼：为()

(五)契丹字

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

© 1994-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.net